

大众消费阶段与社会改革^{*}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 北京 100732)

[摘要]从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出发,认为我国已经从经济起飞阶段进入大众消费阶段,这个新阶段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改革和发展的议题也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不仅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而且也完全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从短缺经济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二是从平均主义到收入差距过大;三是从温饱、耐用消费品时代到大额消费品时代;四是从低成本劳动的“中国制造”到产业结构快速升级的“中国创造”;五是经济增长从更多的依赖于投资和出口转向更多的依赖国内消费。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新阶段,改革要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更加广泛的社会领域,要通过社会改革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各种突出社会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问题,为我国未来一二十年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大众消费阶段;新的阶段性特征;社会改革

[中图分类号] C91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53(2010)10-0022-05

“大众消费阶段”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提出的一个概念,他有一个著名的经济理论——经济成长阶段论,他起初把一个国家的成长分为五个阶段,1971年,他在《政治和成长阶段》中增加了一个阶段,所以到现在是六个阶段,它们分别是传统的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但是,在这六个阶段当中,被大家所接受的核心内容主要是关于起飞阶段的描述和分析,而且他用很多的材料和经验来证明它的起飞阶段的分析是正确的,所以说后来的理论也被简称为“罗斯托的起飞模型”(Rostovian take-off model)。罗斯托认为,起飞阶段的基本特征有这样几个:一是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制造业;二是外国的投资明显的增加;三是出现了区域性的增长极,比较优势从农业转向劳动密集型产品。他根据经验材料,分析了很多发达国家起飞阶段的时段,譬如说英国是1783年到1802年,法国是1830年到1860年,美国是1843年到1860年,德国是1850年到1873年,日本1878年到1900年。罗斯托所说的经济起飞阶段,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但是不同的国家经济起飞的条件是不同的。而中国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个传统的社会,所以在国内甚至国际的经济学界,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起飞阶段是在1977年到1987年。但是,罗斯托的理论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对其他阶段的特征的划分没有这么细致,而且其他阶段没有得到很多经验的证明,特别是关于成熟阶段,他的描述比较简单。所以中国完成起飞以后,我们究竟走向什么样的阶段呢?

我认为,我们从起飞阶段直接进入了大众消费阶段。我们国家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跟以前的很多方面产生了根本性的差异。过去我们主要的分析框架,是改革前和改革后相比较,有两个重要变化造成改革前和改革后的阶段性差异: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体制转变,或者叫市场转型,很多国外的学者,把我们国家放在转轨国家的分析框架和模型里,也就是transitional国家,认为我们和东欧国家及俄罗斯都是市场转型国家。但是从经济成长的角度看,我们和这些国家是根本不一样的,这些国家在它们进行市场化转型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过程,所以之后没有发生巨大的结构性转变。另一个就是把我们放在一个经济起飞的模型当中,例如把我们和亚洲四小龙进行比较,放在东亚雁行模型中,认为这些国家都处在一个儒家文化圈中,都是黄种人,但实际上我们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也有很大的不同,它们的成长过程主要是一个结构转变和工业化过程,它没有一个同时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我国的经济起飞是经济体制的Transition和社会结构的Transformation同时进行,是两T转变。

[作者简介]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本文根据作者在武汉大学珞珈讲坛演讲记录稿整理。

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如果我们总是和改革开放以前相比较,在很多方面已经不能够适应新的变化,所以说现在的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中期,不仅与改革之前,而且与改革初期阶段相比,改革和发展的主要议题也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叫作“新的阶段性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个变化就是“从短缺经济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形势是什么呢?那就是短缺经济,什么都短缺,那个时候的主要任务,就是经济进行规模性的扩张,大量的提供消费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所以那个时候生产什么东西都能卖出去,甚至一些假冒伪劣产品也能够推销出去。但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们从一个卖方市场转变到一个买方市场,买方市场就意味着,我们的生产大体上形成了一个供求平衡甚至供大于求的局面,到现在,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的三百多种产品中,一部分供大于求,一部分我们出现了生产过剩,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很难卖出去,甚至跌破成本价也卖不出去,但是同时新的短缺在形成,也就是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的需求也在提高。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人们在满足了下一层的需要后上一层的需求就同时产生,现在我们短缺的主要表现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现在我们所说的民生问题,已经和改革开放初期有明显的不同,改革开放初期的民生主要是温饱问题,而现在的民生问题主要是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等,这些方面的短缺是什么问题呢?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属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不可能完全靠市场的竞争就能够充分的解决,所以我们现在提出要建立公共财政,实行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这一系列的提法都是为了回应我们现阶段的问题。

第二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从平均主义到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临什么样情况?那就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后来在十二大、十三大的时候,党的主要文献讲,平均主义是我们体制的重大障碍,所谓的改革就是要打破这种平均主义,拉开收入差距,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是我们改革的主方向,而且小平同志在那个时候多次讲,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是一个能够带动全国的大政策。也正是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中国才出现了巨大活力,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性。但是这个问题的转变发生,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收入差距开始逐步越过了合理的区间,走入收入差距过大的状态。当我们想扭转这种趋势,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控制收入差距的时候,这个差距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沿着继续扩大的趋势在发展。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政策的主导方向,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不能说大锅饭情况现在就不存在了,但是收入分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第三个变化就是“从温饱、耐用消费品时代到大额消费品时代”。三十多年来,我们经历了三波消费的热潮,第一波就是解决温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出现了不同的服装和不同的颜色,到九十年代,我们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使家用电器普及到千家万户,这个过程可以说比很多国家的过程都要大大地压缩了时间。那么现在我们应当说,新世纪以来,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消费时代,这就是大额消费时代,这是以汽车和住房进入家庭消费的时代,这个不仅是货币消费的时代,而是信贷消费的时代,这种消费阶段已经和我们的过去有完全不同的。

第四个变化就是“从低成本劳动力生产到产业结构快速升级的阶段”。大家看到,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机遇就是人口红利,劳动力呈现无限供给态势,社会的老人和少儿的总负担系数在改革开放以来是不断下降的,这使得我们有了劳动力低成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比较优势,但是这个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本来我们以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就业会在相当一个阶段非常困难,但是现在恢复的非常之快,而且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怎么管理新的繁荣。我参与撰写的2010年的“社会蓝皮书”总报告,提出我国发展进入一个新成长阶段,也就是说我们本来以为10%左右的增长率,保持三十年了,已经到顶了,按照其他国家的经验,不可能永远保持这么高的速度,但是新世纪以来,我们也是很神奇的继续保持这样的增长率,但是这个阶段同时伴随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廉价的低成本的劳动时代在逐步的走向终结,工资会出现增长,2004年之后间歇性出现的“民工荒”、“招工难”,以及国际贸易市场情况的变化,逼着我们的产业从“中国制造”转向创造“中国品牌”,逼着我们升级创造自己的品牌,要生产有高附加值的产品。

第五个很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发展和增长的方式有了很大的转变,也就是经济增长“从更多的依赖于投资和出口转向更多的依赖国内消费”。以前我国的增长主要都是依靠投资和出口,以前的投资率常年都是在30%以上,而外贸依存率最高的时候达到过70%,国际金融危机前常年是在60%左右。但是我们看到,现

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很多国家为了保护它们的就业岗位,对中国的贸易诉讼案件在急剧增加。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如此高的依赖于出口来保持经济增长,是有很大风险的,而投资的过量也会带来很大的风险,虽然我们投四万多亿人民币下去保增长,但如果我们不在适当的时机逐步退出的话,也会造成重复建设、产能过剩、通货膨胀以及投资效率下降的问题,所以从根本的方式上讲,我们要更多的依赖于国内的消费。这就需要国内的消费有一个根本性的判断,就是我们的消费是否能够支撑我们未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是不是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也许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乐观的判断,但是我们从一些关键性的指标来看,我们这个时期已经到来。一个就是人均 GDP 的增长,改革开放初期,人均 GDP 200 多美元,我们用了大概二十年的时间,到 2000 年,我们达到了八百多美元的地步,2003 年我们首次超过 1000 美元,三年后的 2006 年,到了 2000 美元,2008 年超过 3000 美元,今年(2010 年),我们预计要达到 4000 美元。但是我们同样看到,地区的差别是很不平均的,最近出了一个区域竞争力的报告,就是把各省市的经济水平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有大概五六个省达到了 G20 国家的水平,虽然我们的平均数据还很低,但是中国是大国,很少百分点的增加,都是一个消费市场极大地增长,所以我们十三亿人平均每人增加 7 元消费,就是一个 13 亿美元的巨大消费市场,这也就是国际各大商家瞄准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和消费水平是具有相当大的联系的,譬如城市消费和农村消费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接近 50%,当然不同的学者还有很大的争议,因为国家统计局算的是常住人口,常住人口里面,它包括了在城市里面工作半年以上的农民户籍人员,比如农民工,他们还没有真正市民化。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沿海一代经济发达的区域,很多农村区域按照国际标准也是城市化了,如果按照欧洲的标准,两千以上的聚集点就叫做城市,当然他们那个地方农村比较发达,所以住房和生活水平也没有什么差别,差别主要是在商业和金融这些方面。现在我国正在加快城市化进程,要放开很多中小城镇和中等城市的进入的限制,迅速的开展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在这一个方面,我们也会有一个较快的发展。第三个指标就是二三产业的从业者比重接近 70%,这是按照国际的标准来衡量的进入大众消费阶段的象征,当然这个指标是大大滞后于经济产出的结构。在 GDP 里面,农业的比重已经只有 10% 左右,但是农业的从业人员还是很多,这是由于人多地少,农村都是小农,这是很难富裕起来的。有的社会学家就说,我国的社会结构比经济结构晚 15 年。第四个就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这也是国际上提出的一个标准,到 2010 年我国的大学毛入学率达到 25% 左右,这和我们这几年的扩招有关系,所以围绕这个有很多的争论,所以现在有人说就业难是不是大学扩招惹的祸,但是从实际的指标来看,我们还差很远,尽管我们的指标在快速的提升,离我们成为一个人力资源大国还差很远,像台湾地区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 90% 以上了,一般发达国家也在 60% 左右,我们才 25%,所以我们需要继续培养这种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第五个就是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接近 30%,也就是食品消费占整个消费的比重,它表明越低的系数生活水平越高,但是按照国际统计局的数字,农村在 42%,城市也还在 37% 左右,而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恩格尔系数有高估的成分,也就是我们把住房的价格在消费中的比重低估,也就是其他方面低估了,在食品方面的比例就会高估。第六个就是消费的第三波的到来,从一个满足温饱的阶段,到耐用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的阶段,到现在大额消费额阶段的到来,现在我认为最大的消费影响因素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因为城市的消费方式和习惯和农村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的整个经济增长中,农业的增加值在 GDP 中只占 10% 左右,按照常理,农业的从业人员应该下降到 25% 左右,但是现在我们的农业从业人员还占 38%,大大的和经济结构不相符合,而按照居民的居住来看,农村的居民就更多了,还占 42%,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还是 48%。这三个结构本来有一个均衡的比例,也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但是实际上会存在一种背离,这种背离就是社会结构的转变慢于经济结构的转变才形成的不协调的问题,包括我们的消费不能够快速的成长。

我国消费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除了汽车和住房进入大众消费,一些新兴消费,如信息通讯、教育、医疗、休闲、旅游等等,都增长的很快。过去消费总额长期以来一直低于投资的增长,从 2004 年以来,出现的一个新的局面,这个局面就是消费的快速增长。200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大概 16%,几乎高于 GDP 增长的一倍,这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局面。现在消费增长的速度和投资增长的速度在靠近,如果什么时候消费的增长能够超过投资的增长,那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就建立在更加依赖于国内消费的基础之上。但是我们同样能够看到一个矛盾的现象,我们总说消费不足,但是这又和某些现象产生矛盾,比如说房价,也就说在

通常情况下,当你消费不足的时候,会出现房价低迷,消费低迷,也就是说在消费上供大于求,才会出现消费不足的现象,但是现在好象不是这样,房价在不断高涨,这么多人都想买房子,消费不足还要花这么多力气来打压房价吗,为什么这么高的需求我们不能够满足,所以住房是一个很奇特的消费,与一般商品不一样。大家的预期就是赶紧要买,不买的话到时候就买不了这个房子了,价格是不断上涨的,为什么会有这种预期呢,就是因为住房是消费品也是投资品,买房子有的是消费需求但也有的是投资甚至投机。我国消费有很多相互矛盾的特征,一方面,在西部,在农村,更多的人在生活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局面,但同时,大量的奢侈品,化妆品,包括什么人头马、名牌化妆品、名牌箱包的消费啊,我们都排在世界前几位了,这也是相互矛盾的。那你这个国家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啊,说有钱人均 GDP 才四千多美元,而发达国家都在两三万美元,说没钱吧,我们的出国旅游团一人就买十几个名牌箱包回来送人。我们的统计确实表明,我们城镇居民的收入以快于 GDP 的速度在增长,但是同时,老百姓感觉到,这个收入好像是“被增长”了,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民众的平均收入线和整个的社会的平均收入线不是一回事,要是收入差距大的话,60%到70%的人在社会的平均收入线以下都是可能的,千万别认为平均线应当就是日常水平。城乡居民储蓄率余额,它的增长比我们的收入增长还要快,原因有很多,有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隐形收入。在中国,收入是一个最说不清的,最难以调查的一个数据,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严格的财产和收入申报制度。本来我们储蓄的增长,理论上应该是全国居民的收入减去消费,再减去手持现金,还要留一部分去投资,剩下的那一部分才有可能去储蓄,但是每年仅仅储蓄增加的那块,就大于收入减去消费的余额,这也就是说,有很大一部分收入是没有办法来了解和统计的,这个特别现象很明显的表现在住房问题上。如果我们从现在的各种消费品的改善和增长来看,住房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改变最快、最大、而且是最深刻的领域,我们会看到农村居民人均的居住面积从过去不到五平方米,到现在人均三十多平方米,城市居民也从过去的三点多平方米,到现在的二十七八平方米,我国的户均拥有住房率几乎是全世界最高的,数据显示高达90%左右,当然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农民多,农民都有自己的住房,另一个原因是住房改革制度,就是在改革以前有很多的房子是福利分房,在一夜之间通过住房改革以福利价格卖给了每一户,所以使大多数家庭都拥有了住房,在国外你会看到在一个社会当中,百分之五六十的人都是租房的。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十年前,十五年前,我们的家庭住房是什么样子,拥有一百多平方米的住房,这在十五年前,是不可以想象的。现在我们实现了这个梦想,但是你会发现,住房问题反而成为人民群众最不满意,最为抱怨,最为诟病的一个方面。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因为住房这东西和其他商品不一样,住房与土地连在一块。我国人多地少,耕地稀缺迫使我们严格控制土地。控制土地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房价的升高。不断出现地王,地王的价格只能算在房价里,分摊在住房里。如何扩大住房,比如现在有种思路,说新加坡、香港所谓社会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等。但是我看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不是新加坡、香港几百万人,靠政府的力量就能解决这么多人的住房。所以按照我们过去发展市场经济的一条经验,就是要掌握市场的供给力。如果有个办法,能够满足群众的住房需求,政府又有税收,我们经济又获得增长的新动力,这是多好的事。比如说,我们使农民的住房进入消费市场,因为住房里边一大半都是农村住房。但是现在,在城市里边,土地是国家的,住房可以完全变成自己产权。你可以出租,可以转卖,还可以抵押。农民住房是集体用地,土地是集体所有,宅基地上面房子是自己的。他们的房屋为什么就只有使用证,没有产权证,他们的房屋就不能转卖、不能抵押。如果允许农民的住房进入市场,对于平抑房价、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都是有好处的。当然这不是一点副作用都没有,拆迁成本会更高。政府要权衡利弊,在各种选择中选择更好的一个。

但是我们感觉到,现在很多问题和我们的预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到底为什么现在消费不振,消费不振当然是有指标的,比如说,从1985-2008年我国居民的消费率从52%下降到35.4%,所谓居民的消费率,是指全部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重。这个35.4%的消费率在各个国家来看都是很低的消费率。美国的居民消费率很接近70%,日本63%,而且我们的消费率是随着收入的增长不断下滑。美国3亿人一年消费10万多亿美元商品,我们中国13亿人一年才消费1万多亿美元。所以你会看到消费市场的大小不是以人口计算的,是以可支配货币计算的。1990-2008年,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83%下降到72.7%。消费倾向的指标是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即你收入一百块钱有多少钱用于消费。另外,1991年至200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居民储蓄存款的比例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由1991年的1.02下降到2008年的0.50,下降了

一半多。这是三个关键性的指标。

消费不振应该是因为缺钱。但我们国家现在似乎不是没有钱, 1994年到 2008年, 我们的税收总量从 5000多亿元一下子增加到 5.4万多亿元, 年均增长 18%, 远远高于 GDP 增长, 政府支出占最终总消费支出的比重, 20世纪 80年代为 21.6%, 90年代为 24.2%, 现在约 27%。老百姓似乎也有钱, 1994-2009年 3月,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 2万多亿元增加到 24.7万亿元, 年均增长 18% 以上, 相当 3/4 强的一年 GDP。国家想让老百姓消费, 通常的办法就是降低利率, 现在的一年存款利率只有 2.25%, 低于物价上涨水平, 所以存款不是增值保值, 是贬值, 所以低利率的方法就是迫使你把钱取出来进行消费。为什么老百姓不花钱呢? 根本原因就是跟我们分配结构有关系, 虽然存储的总量是在增加的, 但是分布既不平均, 所以有钱的不一定消费, 消费的不一定有。

我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 现在在全世界都是比较高的。除了收入差距, 社会分层的结构目前还是呈现金字塔的形状, 要转变成以中等收入者为主的橄榄形, 还要经过很多年的努力。只有当农民大量减少, 农村的居民多数已经不是从事农耕生活的时候, 这种转变才会完成。如何使农民富裕起来, 是实现社会分层结构转变、扩大消费的一道坎。我国农民的土地经营规模太小, 即便是东北这样耕地广阔地方, 每家最多也就是二三十亩地, 但是在一些发达国家, 像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平均一个农民是三四十公顷, 你要达到这样大的规模你才能进入中产生活水平, 当然美国就更没法比了, 美国的农民平均一百多公顷, 所以我们和他们的差距很大, 我们没有土地, 没法向外扩张, 只有向内发展, 大量地投入增长, 投入人力, 投入时间, 但是毕竟土地太少, 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也不行, 即便是种花种菜也不行, 因为只有大规模地种才能拥有中等收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 对于我们消费的限制, 就是中产阶级的比例太小。中产阶级的概念还比较模糊, 经济学家们把中产阶级的资产、收入、住房作为指标, 社会学家很重视职业, 现在我们国家用职业、收入、教育来测算中产阶级, 测算出的结果是中产阶级占从业人口的 12%, 那么还有 20% 是边缘中产, 边缘中产还不是中产阶级, 但是未来可以发展成为中产, 在未来二十年能够发展到 30% 的话, 还是一个比较快的速度。当然我们国家中产阶级比例过低还是因为农村的人口太多, 如果我们只是计算城镇人口的话, 中产阶级比例在 2006年测算可以达到 25%, 如果我们参照韩国, 韩国现在的中产阶级比例是 46%, 比我们还是要高很多的。

为什么我们说收入差距对我们的消费会有影响呢, 就是在消费当中, 有一条定律, 就是家庭消费率随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递减, 收入越高, 消费率越低。这什么意思呢? 家庭消费率是指家庭消费在家庭收入的比重, 如果我们把家庭分成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五种类型, 那么低收入家庭的消费率高达 90% 多, 但高收入家庭收入一百块钱, 花去的大概还不到六十块钱。那么也就意味着, 你要想扩大整个国内居民消费的话, 要使新增张的收入更多地转向中低收入阶层, 这个消费总量才有可能扩大。另外, 现在影响家庭消费的三个主要因素, 是教育、医疗和住房, 这些方面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预期。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去大量地储蓄? 现在好多的美国人老是用文化因素说事, 说我们美国人是信贷消费, 我们都是把下一辈子的钱先借过来, 先花掉, 你们中国人是反过来, 存的钱给下半辈子、下辈子人花, 你说你们傻不傻? 但是我就说, 这不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可以解释的, 什么东西你单用文化来解释的话, 就会陷入一个很模糊的、很难说清楚的领域。实际上你会看到, 我国民众之所以高储蓄, 是他自身的一个理性行为, 也就说一个家庭, 他需要自己规避未来的风险, 我家里子女上学怎么办? 我生了病我没有医疗保险, 我看病怎么办? 我养老从哪来钱? 我要攒钱买房子吧? 各大银行系统都做居民储蓄目的的调查, 这类调查结果显示, 排在前三位的储蓄目的, 大概都是为了子女教育、看病和买房。我们需要通过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来给民众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民众有了稳定的未来预期, 才敢于花钱进行即期消费。

从以上的分析大家会看到, 扩大国内消费, 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 而是与很多社会体制问题联系在一起。要建立工资和收入的正常增长机制,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实行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加快城市化的步伐等等。社会体制的改革涉及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等领域, 这里面非常关键的就是收入分配体制, 会触动既有的利益格局, 当改革进行到关键时期, 使一部分人获得利益, 同时又影响到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时候, 改革就会遇到难题和阻力, 但是我们要坚定信心, 坚持改革, 为社会的发展不断提供新的动力。而与此同时, 在结构性的转变当中, 我们要意识到工业化、城市化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我们要使未来一二十年的发展, 更多地依赖于国内大众消费的支撑, 我们不但要国强, 更重要的是让人民群众普遍的富裕起来, 民富才是国强真正的基础。